

# 现代日本国民主义与“教科书问题”<sup>1</sup>

## 一、前言

今天，请允许我以“现代日本国民主义 (nationalism) 与‘教科书问题’”为题发表浅见。正如各位所知道的，2006 年，安倍晋三内阁成立后，其一贯的“右翼”发言使得日本的右倾化，或者说国民主义的强化令人倍感忧心。的确，诸如所谓“美丽的日本”这样的极具美感、略带感伤的口号的登场，重视“道德”的教育改革，针对旨在承认自卫队及天皇元首化的宪法“修正”而采取的国民投票表决，这些举措都使我们无法否认右倾化已经全面展开。同时，我们正处于一个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前首相小泉的“结构性改革”政策促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为了抑制和隐没社会分裂，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变得必要起来。而在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中，安倍政府提倡所谓“战后清算”，针对“从军慰安妇”问题，反复发表几乎颠覆了目前为止的“反省”态度的讲话，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右倾化象征，令人忧虑。此外，众所周知，与政教分离问题、战争责任问题息息相关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也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深刻事态。

针对上述右倾化的展开，我并不想从正面进行否定。事实上，不如说作为一名大学在职教育工作者，我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这样的倾向已经存在于年轻人之间。然而，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这一倾向并不会如此单纯地发展下去。其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第一，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主权，都无法与当今的全球化 (globalism) 趋势对抗，而只能作为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而存在。在此借用内格里和哈特<sup>2</sup>的话来说就是：不得不说，全球化作为一个“帝国”正凌驾于全世界国民国家之上，极大地制约了十九世纪以来国民国家所保有的权力和权限。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日本政府，或者说日本国家能够无视这一“帝国”的政治意志、经济意志而鲁莽行事。当然，现在我们还不能乐观的认为当今的全球化已经完成了对国民主义原理的解体。甚至可以说事实恰好相反。全球化的发展，正确地说是“帝国”化的发展，正推进着以自由竞争为名的全世界国民国家的序列化，并最终激化了全世界的严重纷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原本就不平等的国民国家之间的差距、榨取愈加扩大，性命攸关的竞争愈演愈烈，最终，这样的全球化以国民主义，或者“宗教国民主义”的形式爆发。日本现下的右倾化也与此动向相关。但是在此，我想说的是，正因为如此，19 至 20 世纪前期的国民主义并不可能单纯地复活。如此，右倾化作为以全球化为媒介的国民主义，在此借姜尚中之言<sup>3</sup>，被“国际化”了，“作为内外相互渗透的国际化了的日本国民主义”，受制于所谓的国际架构。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现下的右倾化正是为了能够在这样的国际架构中取胜而制造的一个对策。不用说，国民主义只要还是国民主义，就必然以其古典的形式，即所谓“传统”、“美学”等而作用。而这精心制作的“自然”的伪装，也在安倍政权的路线中有所表现。然而，无论多么“自然”的伪装，现在因受制于国际架构，比起 20 世纪前期，其做作性都变得显而易见，并且会表现在我们之后将要谈到的“教科书问题”上。在此希望能够唤起各位的注意。

第二，我想把目光转向与全球化相关却又界限分明的“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上。长期以来，国际主义终于有了一定的发展。关于所谓“韩流”，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们当然也必须知道，决不能将此当作扭转日韩关系的特效药。<sup>4</sup>当下，日本有关北朝鲜的舆论主要集中在“拉致问题”上。我想这已成为目前日本右倾化的一大诱因。至 1990 年代，针对朝鲜半岛=韩半岛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战后责任问题的认识正步步迈向成熟，“拉致问题”无疑给这一舆论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一情况与“韩流”共同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仅靠“韩流”是无法使日韩关系好转的。但是，就我个人来到韩国之后所切身体会到的那样，与“韩流”相关的多种多样的交流在“草根”之中正得以逐步实现。为学习韩语而赶赴韩国的留学生和语言学习交换生的人数之众，

也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以我前些日子造访釜山虚心厅的经历为例，我看到从九州柳川而来的许许多多的中学生和韩国的中学生们，进行着赤诚坦白的交流，吵吵嚷嚷非常热闹。听说每年这样以家庭寄宿的方式进行的交流活动已经成为惯例。在我的眼里，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欣慰的画面啊。我不由乐观地预想，这样的相互间的语言学习和交流既然已经切实地成为惯例，那么促使近代以来日韩关系达成划时代转变的“国际主义”也必将成长起来。诚然，我们也可以预想到，一部分人并不会以此动向为乐，相反，这样的刺激也可能催生出诸如“厌韩流”这样的意识，但如果我们仅仅因此就反应过剩，反而只会是高估了如今仅存在于少数派中的“厌韩流”思潮。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教科书问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毫无疑问，日本文部省（之后的文科省）和日本政府应当对这样的教科书得以通过审核这一事件本身承担责任。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教科书的采用率仅为历史学科的 0.3%和公民学科的 0.19%（2006 年）<sup>5</sup>。如果我们将其扩大为一个整体社会问题，反而正中“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之下怀。编纂会员们所期待的，正是要在日本社会或者说在日本与东亚社会中制造一种分裂，从而扩大日本的国民主义。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判。同时，为了有效地向世人说明这仅仅只是极少数的意见，多种多样的“草根”交流也更为重要。并且，虽说只是少数意见，我们也必须充分理解韩国和中国的诧异的感受。但是在此，我首先声明我的主张——右倾化绝不可能单方面畅行无阻地发展下去。

## 二、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

说起“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不用说其中问题极多，并且明显地反映了当下日本的右倾化倾向。但是，我在此斗胆认为，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视点——这些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这一本教科书之中。接下来，我想就此展开讨论。首先，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人”是一个含混模糊的概念，我们先从自己开始说起。站在这里的是叫作桂岛的“我”。同时，这是一个作为男性的“我”——当然，在座的也有作为女性的“我”。更可以说——在这里并不是要夸大什么——是作为桂岛家族一员的“我”。事实上，“桂岛”这个姓在日本算是相当少见。据说这个家族曾经是宫城县的没落地主，不管怎么说，这其中都有着一个家族的历史。在此之上，还可以考虑我成长的地方，也就是能称为故乡的市町村、都道府县（韩国叫作市或郡、道）。我想在座各位中一定有人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事实上，战后日本历史学的一大成果就有乡土史=地方史，出现了大量的市町村史、都道府县史。再进一步说，我是一个日本国民，持有日本国籍，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日本人。当我们思考作为日本人的“我”时，就会想到这个“我”之中存在着日本的历史。我们再扩大一些，迈向日本之外的话，就会看到世界，甚至地球。说到地球，那么不光是人，所有的生命的历史都在其中。从地球到宇宙，有太阳系、银河系，至此，我们已经到了宇宙的历史范畴，也就涉及到从大爆炸开始的宇宙膨胀等等的话题。

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按照上述的想法，“我”是作为一个多样存在的统一体的“人”而存在的。宇宙中的“我”，地球、世界中的“我”，都道府县、市町村、故乡中的“我”，家族中的“我”，处于男、女层面的“我”，由此，好容易才走到了“我”这一概念。

为什么我们要以这样的话题开场呢？我想，当我们探讨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这一问题时，这样的分类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在，日本的学校教育的情况是，从小学开始即教授故乡（即市町村、都道府县）的历史、日本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听说韩国也是这样）。作为研究德川时代=江户时代的人，我注意到：事实上直到江户时代为止，没有一书籍记载了任何形式的有关“国家的历史”的叙述。我想，也许有些人会对此感到意外。他们也许会反驳我说：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开始，到幕末颇有人气的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文政 10 年，公元 1827 年自序）等等，许多的书名不都附上了“日本”二字吗？这不就是“国家的历史”吗？《日本外史》<sup>6</sup>完成于大约 180 年前，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呢？这本书以故

事语言叙述了从源平到德川的武家的兴亡，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日本外史》具有武家兴亡史的特色。当然，这里指的是存在于日本列岛上的武家，从头到尾都是以武家的人们为中轴的。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叙述武家这一“家的历史”的书籍。

同样，在日本颇有名气的还有《大日本史》。由水户光国开始编纂（明历3年，公元1657年），直到明治时期才告完成（明治39年，公元1906年）的《大日本史》，充分考虑了中国正史，采用纪传体，每一位天皇都以某某传为名书写，这和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书相比具有相当不同的色彩。因为中国的正史如此，所以采用了天皇逐代叙述的形式。这本书记录了从神武天皇开始到南朝灭亡时期的后小松天皇为止的每一代天皇。因此，《大日本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天皇家的历史》。

或者我们可以看看作为史家的名人新井白石所写的《读史余论》（正德2年，公元1712年完稿）。在这一历史书中可以看到朱子学的见地。新井白石的著作考虑了中国儒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宋〕元丰7年，应德元年，公元1084年成稿）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其大纲约完成于〔南宋〕乾道9年，承安3年，公元1173年），记录了武家与天皇家、公家<sup>7</sup>的兴亡。这也应该称作武家公家兴亡史。又或者如南北朝时期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约成书于历应2年，延元4年，公元1339年），则是以从神代<sup>8</sup>到后村上天皇为止的皇位继承为中心叙述的，而慈円的《愚管抄》（约成书于承久2年，公元1220年）也是从公武调和的视点出发叙述的公武兴亡史。就连《古事记》、《日本书纪》，也正如战前的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所说的那样，是叙述天皇王权的正统性由来的历史书。

我们把这些书籍放在一起，可以说都是关于某家的历史，却无法称其为日本的历史。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这一点，我想引用福泽谕吉的话。福泽是明治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著名启蒙思想家。他在著作《文明论之概略》（明治8年，公元1875年）中曾这样感叹道：“日本没有日本国的历史，唯有日本政府的历史。”<sup>9</sup>那么福泽又是从何处得知“国家的历史”的呢？事实上，他是从欧洲的历史书上学到的。他感慨道：“欧洲有着详述国民国家的书籍，而在日本，只存在政权更迭史，最多不过记录某家的兴亡的历史书。”他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国家的一大缺点”。在福泽写成《文明论之概略》的明治8、9年，即公元1875至1876年的这一阶段，基本上之前还没有任何书籍可以称作日本国的历史。也就是说，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几乎已经成为常识的日本史=日本国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的书写方法，或者说全新的历史书。更准确地来说，是“近代以后成立的历史叙述方式”。在此希望提起大家的注意。

### 三、前近代历史叙述的特质

那么，前近代的历史书又是什么样子呢？它们以何种形式叙述历史呢？在此我想通过和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的比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历史书中，《大日本史》、《读史余论》、《日本外史》等都非常有名，甚至刊载在高中的教科书上。然而，可以说它们都是站在儒学的立场=朱子学的立场上写成的。总的来说有三大特色。<sup>10</sup>我认为在我们讨论“编纂会”的教科书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

第一是“治乱兴亡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是时而治世时而乱世的连绵不断的重复的观点。因为这种重复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循环史观”。这是我们业已失去的对历史的一种看法。现在的我们虽然也说历史是重复的，但只是一种比喻。然而对于江户时代的儒者而言，这却绝不是一个比喻而已。历史会重复，而且会超越国境地重复。他们为什么拼命地阅读中国的历史书？和我们阅读别国的历史书不一样，因为他们认为既然会重复就一定有参考的价值。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书在作为中国的历史书的同时，也是普遍的历史书。近世的儒者是以中国的历史书为样本来撰写历史的。这从《日本书纪》开始已经是如此。到了江户时代，历史书也仍是以同样的形式写成。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新井白石就是参照了朱熹的《资

治通鉴纲目》写成了《读史余论》。总之，希望大家注意，“循环史观”是超越国境的历史观点。

第二是“鉴戒主义”。这是一种以史为鉴=镜的观点。就是说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严肃地看清过去的错误，认真学习治乱兴亡的叙述，反省为什么会有乱世的出现。因为他们相信历史会重复，所以比起现在的我们，他们更加紧张地通过读史来学习。因为历史是真正的镜子。他们全力将其作为鉴=镜，并从中找到教训警戒。这样的观点在日本各种著名的历史书中都能看到。像《大镜》、《今镜》、《水镜》、《增镜》这样的古代、中世的著名历史书，光从名字便可看出这样的视点。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贞观政要》，约成书于〔唐〕开元8年，养老4年，公元720年）便是如此。它要求我们认真看待失败。

第三点是“直书主义”。朱熹说：“据实而书，理自现”（《朱子语类》第八十三卷，〔宋〕咸淳元年，文永2年，公元1265年刊行）。如能“直书”“事实”，便能避免书写多余的事情，“理”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因此，在正式的历史书中的“纪”，解释的部分往往另记，只是平白地记录下“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由此“善恶自著”。在此顺便做一下申明，我认为“事实”与解释是不可分的。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看来，即使这样的儒学家、朱子学者的历史书也没有脱离解释。他们主张不加修饰地记录“事实”，让“理”自然地显露出来。但在他们选择某一“事实”加以记录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着某种解释了。因此，严格说来，“直书主义”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和解释毫无关系。只是至少在他们的主观的层面是“直书”的。他们只求以判断句的形式淡然地留下记录，之后不加一句解释，由此使得“理自现”。

综上所述，我认为儒家历史书大概都有这样的三大特色。江户时代，这样的儒学系统的历史书非常盛行，通览全局我们立刻就能注意到这三大特色，也就是“治乱兴亡史观”（即“循环史观”）、“鉴戒主义”、“直书主义”。这样的历史观曾经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近代之后大多被抛弃了。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教科书问题”时，对照这样的儒学史观就会有許多想法浮现。在下文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

在此，我还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史”这个汉字。已故原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白川静教授，在他的名作《字统》<sup>11</sup>中详细探讨了各种汉字的构成。“史”是什么？在几乎所有的汉和辞典中都讲道，“史”是由汉字“中”和表示“手”这一意象的“又”字组成的，其中对于“中”字又有许多的说法。白川先生认为，“中”字是表示祈祷器具的“𠄎”（读作 sai）插着树枝的形象。人们手持这一祭器，奉献给神明的祭祀仪式就是“史”的原意。之后，祭祀的祝词保存下来，这一传统也得以保持和记录。而担负管理和保存各个王权的祭祀仪式的记录职责的人，也就成了“史”。

在调查“史”这个汉字时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后汉时期成书的中国最古老的汉字辞典《说文解字》。在《说文解字》中又是怎么说的呢？“中”被解为“中正”，“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sup>12</sup>。这一说虽和白川先生的说法不同，但很令人深思。我们很难说究竟什么是“中正”，但至少要作到“中正”、“中庸”地记录，就是没有偏见的严格记录。儒者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在今天，探讨什么是“中正”是个大问题，儒学家们的依据是“经书”，他们以此为基础明白什么是“中正”。而现代的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依据。没有依据的我们要想记录“中正”是相当困难的。《说文解字》所说的“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我们思考“历史教科书”问题时可谓意义深远。

上述“史”字的语义及其相关的对“史”的看法，对日本前近代为止的历史叙述、历史书有着很大影响。我们看看江户时代的历史书的著者们的作品，虽然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有偏颇之处，但至少在他们心中，是为尽可能地“中正”地记录而努力着的。林罗山、林鹤峰的《本朝通鉴》都是心血之作。《大日本史》的编纂官们也有过激烈地讨论。在此介绍一个有

趣的讨论。《大日本史》的编纂从德川光国开始，贯穿近世直到明治时期才得以完成。按照现在的学说一般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sup>13</sup>编纂后期与后期水户学息息相关，大体上可以说是从立原翠轩开始。其中著名的德川齐昭（即烈公）、藤田幽谷、东湖亲子、会泽安等人，因为之后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关联，编纂后期也可谓是水户学、天保学的母体的形成的时期，而编纂前期的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前期《大日本史》因为追求“中正”所以记载了天皇的“得失”，记下“这个天皇做了这样的坏事”，书写了天皇的“失政”。然而后期水户学认为这是对天皇的不恭，因此删除了这些部分。这样的部分让人感到后期水户学一下子向近代以后的历史观靠近了，但必须看到，这种连天皇的“失政”也全盘记录，为了能够作为鉴戒而正确书写历史的方法存在于《大日本史》编纂的根本之处。新井白石在《读史余论》中也写下道：“后醍醐，中兴之政不确也。”“后醍醐不德”“南朝既亡”，由此王朝更替，“天下全然武家之世代”。新井白石对于“王朝更替”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协调感。因为他站在“天命已去，异姓革命自当起”的儒者的立场，所以有着这样的见解。可见到江户时代为止，历史学家们仍会写下诸如“后醍醐不德”这样的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辛辣的批判。<sup>14</sup>

以上我所说的，并不是想要申明江户时代有多好。只是认为，当我们考察近代以后的历史书和历史叙述时，将江户时代的历史书作为参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我们生活在近现代，就认为近现代的观念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将这些理所当然的观念相对化，对江户时代的同一事物进行检讨将会非常有效。当我们前近代的历史书作为参照时，就不得不承认近代以后出现的历史书与前近代为止的历史书有着多么明显的不同。

#### 四、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

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的一大特质是致力于“一国史”、国民历史的叙述。福泽所谓“日本没有日本国之历史”，“必须尽早书写”的想法，被明治政府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明治时期，历史叙述作业大致在以下两方面展开。<sup>15</sup>其一是大学，即东京帝国大学。其二是在野。在野方面比较注重平民层面。东京帝国大学的人们因为受到儒教的影响，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王朝兴亡史观。与此相对，山路爱山、德富苏峰、竹越与三郎等人则致力于对平民的叙述。可以认为，战后的历史叙述也关注到了爱山、苏峰、竹越之流。战前的教科书虽然试图书写国民的历史，但仍不自觉地成了王朝兴亡史观式的东西。我虽然认为帝大史学会编纂的《校本国史眼》算得上是近代最早的日本通史，但同时也认为，它带有一种过渡性的性格，以天皇家和武家为中心进行了叙述。总的来说，在野方面更早地着手叙述了普通民众、国民曾经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与这样的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近代为止的历史书，事实上强烈地关注了共同性的叙述。中国、东亚等等整体在同样的历史中运转。这样的观点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站在儒教的立场来看自然是如此。“道理”、“正理”是前近代历史书、儒教系历史书的关键词。《愚管抄》等书也是如此。虽然对《愚管抄》究竟属于佛教系统还是儒教性质仍有争议，但《愚管抄》的关键词也是“道理”<sup>16</sup>。这一关键词不仅仅只是支配了日本列岛、日本王权，对于这些史学家而言，至少世界的全部——在当时来说，只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虽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狭窄的世界，但当时的学者们却认为这个“道理”并不仅局限于日本，而是世界的“道理”。“道理”与历史融会贯通的看法贯穿全体，因此，历史叙述没有国境，都凭着同样的“道理”相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明明写的是日本的事情，却突然跳出有关中国的叙述。写到日本的事件时，极其自然地出现“中国也与此相当”的字眼。为什么这些现象成为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认为“道理”二字放之四海皆准。

我们以此作为参照，再来看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极其鲜明地将重点放在了日本的“固有性”上。明治时代的学者中有不少是去欧洲留学后回国的。

比如明治时代的学者井上哲次郎就是在德国留学时学习了历史的书写方法。他们都是带着惊讶回国的。惊讶什么？惊讶于一种构想的逆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记录的是只有我国才有的东西。否则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就无法成立”<sup>17</sup>。那里也有，这里也有，到处都有的东西不能算是我国的历史。我国固有的文化，我国固有的特色，不记录这些是自己的历史无法成立的。这正是明治时代的学者们游历欧洲之后的深切体会。如今的我们，因为所读所见都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已经习惯，变得迟钝了吧。“我国固有”这一说法，如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日本文化的特色”、“日本历史的一大特色”、“日本式的美”之类的说法。但明治时代的学者们却是带着一种震惊回国的。可以说是180度的转变。他们认为自己非去发现一些我国固有的东西不可。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认为冈仓天心这个人“发现”了日本的美。我认为，如果不把欧洲美术作为媒介，他是无法看到日本的美的<sup>18</sup>。正因为费诺罗萨说出了“日本的固有之美”，冈仓天心才明白“原来这种东西就叫做固有之美啊”。由此，才“发现”了日本的美。顺便说一下，所谓美术书、美术史在江户时代并没有大量存在。我们大致地浏览一下就可以看到，江户时代的美术书中，有关禅和佛教的论述比较多。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一些与西洋作比较的看法，到明治时期，原本作为东亚共通的美一下子变成了日本固有的美。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考察近代与前近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的。

近代之后的历史书无论如何都会带有本国中心史观的倾向，也就是记述本国的固有文化、本国的特质。这样的历史记述方法是前近代所没有而近代所特有的。它作为国民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装置而存在。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仅是日本所特有。德国的历史书、法国的历史书，其书写方式各有特色，但其对自己固有历史的书写方法，都以欧洲创出的某种方法为典范。而在近代以后，我们学习并习惯于自己国家的历史、读着浸染了自己的固有特色的历史书，并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浏览日韩的教科书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目次是完全不一样的<sup>19</sup>。因为这些本国史是为本国国民所制作，并未设想到为他国国民所读。所以他国的国民读了也几乎不懂。或者单纯地感到“这种事情我们国家的小学生都知道”，又或者“不知道”。两者没有共通的项目。这让我再次深深地感到所谓本国史就是如此。在对此作解释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各国在事件的选择上存在不同。我们用日本史的说法来讲，元寇、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近代以后的历史等等，到底也还是有些共通的事件出现，但是我们还是惊讶于两国教科书的内容差异之多。因此，我的认识的出发点就在于：当我们探讨“教科书问题”的本质时，“同时性”、“共时性”的视点何其重要。也就是说，至今为止的一国史，过于重视固有性的议论，我们在此则是要选择相反的共通性的视点。为此，作为超越了国境的我们至少需要从已经达成共识的原理开始展开讨论。我们必须尊重相互的国民，必须互相充分认识人权、和平等问题。“究竟什么能作为共通性的存在？”我想从这一问题开始，必然可以展开一场有趣的讨论。不管哪一方的教科书都说着“我们大韩民族的特色正是如此”、“日本人的历史的固有性正是如此”的话，都在书写异质性。而我们要做的与此不同，是要在此探寻共通性，以共通的价值为相互的基础，以共通价值中的历史叙述为目标，这才是重中之重。

## 五、“编纂会版教科书”前近代史批判——以初版为中心

我想，接下来的话题必须以今天的论题为基础。总算进入主题，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版教科书的特色<sup>20</sup>。“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1997年结成。会员包括电气通信大学的西尾干二、漫画家小林善纪，甚至生长之家、神道政治联盟会等宗教团体，以及日本会议、日本青年协议会等，他们认为至今为止的历史书体现的是“自虐史观”，主张制作更能让人为国家自豪，更具自信的教科书。西尾执笔了作为该教科书雏形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并发行了与藤冈信胜共著的《国民的麻痹》。

战后,围绕着教科书问题有过过度讨论。也有人称这次事件为“战后第四次教科书问题”。可以说这次事件与19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的发展、日本的结构性的萧条、甚至1991年后的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等相关的日本右倾化动向密不可分。有关右倾化的问题我们已在开头做了阐述。“从军慰安妇”问题早在三一新书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千田夏光的著作中<sup>21</sup>,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它突然成为焦点是由审判与战后补偿的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从军慰安妇”问题甚至被记载于教科书上。作为个人虽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但在“编纂会”看来,将这写进教科书则是个大问题。1991年,“原从军慰安妇”金学顺实名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补偿,1993年,各教科书一齐开始记述这一问题。然而,“编纂会”的会员们认为在日本的教科书上记述这样的问题是不合适的。而且,他们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的教科书上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记述。而最近政府将错就错的发言也在这一运动的延长线上。由此看来,“编纂会”的活动——虽然正如之后我们会谈到的那样,在其采用率等层面来看只存在于少数派之中——但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过于轻视。

关于教科书的内容,前近代史部分在改订版中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我们以初版(2000年版)为中心进行考察。我比较了白皮本、修正本、市面上销售的普通本,详细地调查了它们在什么地方做了修改,什么地方没做修改,在此只对其特色部分做简单说明。首先,在普通本中对美术作品的相片加上了“可与米开朗基罗媲美”的解说。这是最后定稿的句子。初稿中甚至写上了“远远早于意大利”。这样的句子让人感到滑稽。在这里,一种“足以与欧美对抗的日本之美”的看法露骨地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西尾干二、西部迈的特色了。他们不正是深受欧美中心史观的影响吗?在此意义上,明治以后,日本对事物的近代式的看法,总是与欧洲进行着对比性的叙述,一种异样的浓厚的欧美中心史观色彩呼之欲出,让人诧异难道人们只能写出诸如“在世界的肖像画中也看成精湛”,“在世界美术中没有什么可以出其左右”,“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日本之美”这样的句子吗?然而反过来讲,这样的表述恰恰深刻地表现出所谓一国史真的“可能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表述,也许与西部的退会相关(后述),在2005年的改订版中被删除了。而安倍政权则取而代之,自觉于“美丽的日本”,推出了“有着能够感受美得丰富心灵的日本人”的说法。

在原始、古代部分对“绳文”进行了特写。这一点在改订版也没有改变。市面上的普通本中写作“绳文文化”,白皮本则写作“绳文文明”。这几乎要自称“远早于世界四大文明”的神气真是滑稽。而对于上高森遗迹则有这样的说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可以追溯至50万年、60万年以前。”由于这已经属于捏造,在普通本中被删除了,但在初稿中却是存在的。还附上了照片。在白皮本中就曾出现过篡改捏造。然而,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即使篡改也要引用的行为也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事实”的迟钝。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绝赞绳文文化呢?同时显而易见的,本书对于弥生文化、大陆文化等记述极少。这也充分体现了一国史的书写方法——自己独有的文化、文明必须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而在“编纂会”看来,这自己独有的文化、文明正是绳文。弥生文化因被认为是从大陆传来的,所以这样的文化要尽可能的少写,而为了突出独有性、固有性,他们又不得不对绳文进行特写。虽然“森林与岩石清水的文明”的说法之后被改作了“森林与岩石清水的文化”,但在一开始是写作“文明”的。而对于弥生文化,虽然之后做了删除,但最初则是被称为“外来的少数人传播的新文化”——“少数”的说法之后被删除了。谈到大陆文化,则必须提到《魏志倭人传》。普通的教科书都是由《魏志倭人传》开始叙述邪马台国的。日本的历史在这一部分参照中国古代史书已经是惯例。至少在现阶段没有更为有力的史料的情况下,必须参照中国的古代史书。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这一教科书中,专门写着:“书写《魏志倭人传》的历史家并未去过日本列岛”。他到底想说什么呢?我们会认为他希望传达的是“《魏志倭人传》是多么的不足为信啊”这样的印象。但事实不仅如此,他其实是希望尽可能少地书写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陆文化的影响。在改订版中这一点也没有改变,认为《魏志倭人传》“有许多内容不正确”。



此外，这一教科书泰然写道：“日本从中国独立出来，朝鲜半岛诸国向日本朝贡。”所谓“从中国独立出来”的说法，因为有圣德太子“日出之处天子”云云的史料，在古代史学中也有“东夷小帝国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基本可以认为日本作为岛国，游离于大陆之外，在这一程度上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的。但现在的古代史学的一般说法并不认为日本“从中国完全地独立出来”。而“朝鲜半岛诸国向日本朝贡”的说法则是大问题。战后的日本史研究经过精密的考证，广泛涉猎古代史料，探讨了诸如“任那日本府”、“高句丽好大王碑”等问题。当下一般的论调是大和朝廷支配朝鲜的说法基本不属史实<sup>22</sup>。在其他的教科书中这一点应该是有所反映的，而这一被大多数人所怀疑的事件，在这本教科书中却作了肯定地叙述。在学校学习古代史一定会谈到“大化改新”。战后教科书认为“大化改新”之诏是在《日本书纪》编纂的阶段被夸大的，因此对于其是否能被认为是律令制确立的转机这一问题尚有争论，因此一般的教科书中也不太将其与律令制联系起来进行特写。但是，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却将其作为“明确规定了君臣名分”的史料而大书特书。可以说这部分带有战前的皇国史观的色彩。这一问题在改订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

在今天，神话不等于“史实”已经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个人并不反对收录神话。因为无可否认，古代神话反映着朝廷的思考方法和豪族的世界观等等问题。但是，这本教科书在白皮本阶段明确地写着“可以认为其反映史实的可能性”。这里谈到的是“神武天皇东征”的部分。我想在学术界是没有人会堂而皇之地谈论这样事情的。因此，这是显而易见的歪曲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明确地反映出“想把神话作为史实写入书中”的意图。我认为这并不是收录神话时恰当的记述方法。本书改订版由原来的A5改为B5，削减了100页左右，与此同时神话的部分也由原来的9页减少至3页。但是，和初版相同，本书仍旧延用了将“神武天皇东征”作为大和朝廷成立象征一说，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武作为初代天皇的神话说得仿佛史实一般。

我们注意到，本书中世、近世部分分量很少，但这也并不单单只是这本教科书的问题。本国史—一国史一般都会为古代部分腾出很多页面。在这一意义上，这本教科书算是完美地体现了这一构图。中世、近世部分分量少，这一倾向是世界性的。而这本教科书为什么又特别如此呢，我想其理由有两个。第一是室町时代幕府向明王朝朝贡这一事实非常明确。有关于此的记述在本书中只有一行，而且还写上了“因为反感曾有中断的时期”。我想这其实是想要掩埋向中国朝贡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认为，另一个理由，也是贯穿全书的一点是，这本教科书明显是站在“天皇中心史观”的立场上书写而成的。全书以天皇为中心逐步推进，最后到昭和天皇，以“热爱和平的昭和天皇”为题的专栏作了结尾，从头至尾都以天皇为中心。这也令人禁不住苦笑，因为这样一来中世、近世篇幅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中世、近世是很难以天皇王权为中心书写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要写下去。中世、近世部分的最后写道：“尽管幕府的实力得以成长，但为了保持其国家统治的正统性，幕府也不能无视朝廷”。他们保留了幕府对朝廷无比崇敬的叙述。在改订版中也保留了“幕府尊重朝廷”的字眼。“江户幕府尊重朝廷，同时也努力牵制朝廷。”我想这真是煞费苦心的写法。从史料来看，只能得出幕府“牵制”朝廷的部分，而他们却更想写成对朝廷的“尊重”。我想，中世、近世部分主要可以以这些作为本书的特色，这也是其分量较少的理由。

## 六、“编纂会版教科书”近现代史批判——以改订版为中心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问题最多的近现代史部分。我们以改订版为中心，通过和初版的比较作考察。

改订版和初版一样，对日清、日俄战争以后的日本战争进行了美化、正当化，将亚洲太平洋战争读作“大东亚战争”，不承认其侵略战争的性质，全篇贯穿了将其作为日本的防卫战、为亚洲解放而作的斗争等美化言辞及肯定立场。甚至特别设立了“给殖民地民族以独立



的希望”、“日俄战争——以独立为目标”这样的专栏。对于并合韩国、殖民地统治等毫无反省，反而对其进行正当化等内容和初版一样毫无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将韩国纳入势力范围内并无异议”，认为有欧美的“承认”便是正当的。对于“创氏改名”问题，在改订版的申请本中认为这是韩国人心所望，所以是得到了认可的。通过审查最终修改为和初版相同的说法，即“开展了使用日本式姓名的创氏改名运动”。“编纂会”的会报《史》主张：“对于为声讨日本而捏造的“南京大屠杀”、“朝鲜人强制征用”、“从军慰安妇强制征用”等谎言一律不写。作者应不为这些旧敌对国的宣传和鼓吹所限制进行自由的创作”<sup>23</sup>。由此可见，申请本才最能体现他们的本意。同时，教科书无视日本军“慰安妇”的事实，对南京大屠杀则特意做了“死亡人数等实际情况在资料上尚存疑点，对此见解各异，至今仍存争论”的叙述。更甚的是，近现代史部分对韩国、中国等亚洲诸国的历史进行的污蔑性质的描写尤为显眼。在初版中被删除的“朝鲜半岛长期威胁日本，与日本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的说法，在改订版中以“朝鲜半岛仿佛大陆伸出的手臂般对准日本”，“保证朝鲜不为别国所控制是日本安全保障上的重要一环”的说法实质性复活，这样的叙述旨在将侵略从地理的角度进行正当化表述。书中断言“日本比起中国受到鸦片战争的冲击更大”，认为“中国、朝鲜与日本存在分歧，中国和朝鲜没能应对世界形势，这一看法从初版以来便被继承下来。此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普通平民也积极参战等记述也从初版开始就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这一改订版的一大特色则是一扫初版的反美色调，带上了“脱亚入美”的色彩。比如，初版开头所写的“对欧美列强的恐怖”、“日本军守备队对美军一步不让”等表现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与此相伴的是，在初版中，将亚洲太平洋战争归咎于美国方面的表现也消失了。我想这样的变化与“编纂会”的内讧有关<sup>24</sup>。事实上，“编纂会”内部分裂不断，绝对称不上团结一体。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2002年小林善纪、西部迈与西尾干、藤冈信胜、八木秀次相对立，最终退会的事件。这一事件也可看做是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裂，并最终反美右派与“编纂会”的决裂为结局而广为人知。最终事态演变为小林放弃历史教科书的执笔工作，而西部也辞去了公民教科书的作者代表一职。此外，2006年1月，西尾名誉会长辞职并退会，远藤浩一、工藤美代子、福田逸副会长辞职转任理事，2月，八木会长、藤冈副会长、宫崎正治事务局长遭解任，宫崎退职（解雇）。这本教科书的采用率在2005年据说可以达到10%以上，但实际采用率却是历史学科0.39%、公民学科0.19%。对这一“惨败”责任的相互推卸被认为是此次内讧的最大原因<sup>25</sup>。直到现在，围绕着宫崎的解任，日本会议派的理事（内田智、胜冈宽次、新田均、松浦光修）和西尾、藤冈集团之间仍然在互相揭短。根据西尾的说法，日本会议派四位理事中的三人与宫崎的方针是，“改正”宪法，回归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原点，将天皇中心的“神国”作为目标。他们与试图渗透青年教员和教育系学生的日本青年协议会是伙伴关系。这一事态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主义，但就其方向性而言则有各种不同的路线。而且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一事态也正说明了之前我们所谈到的在当今的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国民主义的再编、筛选越发激烈的现象。事件最终以亲美国民主义派掌握主导权为结果，也正鲜明地表现了“编纂会”实际存在于全球化和帝国化的限定之下。

战后史以初版白皮本的“战后的战争”这一标题开始。这一标题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战后观。“日本没有输掉战争，而是输在战后的战争中。而后者更为严重。”这样的说法是想对战争进行全盘否定。我感到这一主张非常强烈。由美军的占领而开始的一系列的日本的民主化时代、制定和平宪法的时代，被说成是在战后的战争中败北的结果。“比起战败，战后的战争中的败北更为严重”这一说法是初版最后部分的一大基调。改订版也表现出认为东京审判、占领政策扩大了“对战争的罪恶感”的观点。而我感兴趣的是，刚才我们说到亲美的问题，在这里别扭地反映出来。他们无法否定美国的战后政策，但尽管如此为了唤起日本的国民主义却又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表述。让人感到一种“苦涩”和“扭曲”。

“过去的日本不曾在外国的历史中寻求理想，对本国历史不曾丢失自信，从而拥有着坚定的独立心。但是在战败后，日本突然对自己的脚步变得不安，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丧失了自

信。”这是这本教科书最后的话语。这一话语与初版相同。我想，这种明确的战后观清楚地表现了这一教科书现在所处的立场。

其他方面，这一教科书的另一特色则是其低级错误之多。作为一本教科书，有许多不值一提的差错。先不说其历史观的问题，基础性的错误已让人感到极其粗糙。改订版中收录了《多武峰缘起绘卷》（39页），大化改新（7世纪）的插图却出现了平安时代（9至12世纪）的十二单衣、衣冠束带的形象。《楠公一代绘卷》（76页）明明是南北朝时代（14世纪）的插图，却出现了有铁炮口的近世城郭建筑（16至17世纪）。刊登这种当时根本不可能的插画，真是让人“发笑”。初版中低级错误之多早已广为人知。比如并非“御撰”的万叶集被写成“奉朝廷之命编纂而成”。还说“万叶集之后长期被当做典范”（万叶集到江户时代为止都不为人知）。专栏中说“源赖朝被任命为武家第一个征夷大将军”，事实上木曾义仲才是武家第一个征夷大将军。还有“富冈制丝厂等棉纺业”这样的说法。连制丝业和棉纺业的区别也没分清。这些错误充分反映了该教科书的粗制滥造。而审查的通过也足见审查本身的草率。

我想，如果非要肯定某种已经被广泛否定了的说法，至少也该拿出一些证据来。事实上，暂且不提他是否正确地把握了原文的主旨，我们可以感觉到西尾干二还是读了不少专业书的。看看《国民的历史》就能发现许多断章取义的地方。而那些被他随意引用的原文作者们大概都很无奈吧。这其中有纲野善彦的研究，近世史方面则有外交史研究者荒野泰典的论说，有关自由民权运动也能看到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的章节。如果要引用，为什么在古代史却看不到这样的引用呢？这真是令人疑惑。只能叫做断章取义。

再来说说历史观的问题。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非常清晰易懂。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其本国史=一国史的主张和写法、记叙方法。真是明明白白。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的，本书采用了从原始古代开始贯穿整体的天皇中心的记述方法。我们虽然感到天皇中心是个大问题，但这种主张日本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论调之上抬出天皇的论法，自本居宣长以来便是如此。因此，与其说这只是这本教科书的问题，不如说这本教科书极致地表现了近代的历史叙述、本国史的叙事所持有的倾向。特别是天皇中心的部分让人感觉如此。这种叙述方法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已经不太被采用了。从总体上来看，本书侧重于古代史和近代史。这种不平衡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这也是本书所表现出的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的特点之一。

本国中心史观并非只是这本教科书所持的态度。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大多抱有本国中心的倾向。与此相对，这本教科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关于对外关系的叙述。本书的对外关系全部是以力量对抗——简单来说就是权力平衡的观点进行叙述的。一般而言，现在的教科书都会以海外交流、文化交流为重心。而这本教科书则注重力量对抗、国家对抗是如何分布、什么地方又突然增长等问题，简直就像在看模拟游戏《三国志》中的城池争夺大战一样。这样的叙述贯穿全书。这种见地实在让人感到异样。

此外，有关国家范畴之外的世界动向、亚洲民众等问题则基本没有提及。一开始，我以为这本教科书是“日本史”教科书。但冷静地想想，中学里似乎没有“日本史”这一科目。中学里所设的是“历史”。是在叙述世界历史的整体之中记述日本的历史，这才是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而这本教科书明显地以日本为中心，对世界的动向、亚洲的民众、琉球、日本的不同地域等不作叙述。他们要求学生做“地域学习”，而这本教科书中却几乎看不到地域的影子。普通平民也不存在。至于女性则几乎不见踪迹。而对受歧视人群的论述之少也算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 七、结语

差不多该进入总结了。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这本教科书不管初版还是改订版都问题颇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虽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为本书辩解的意思，但当我们思考教科书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思考一国史=本国史所固有的特质。这一特质并不仅限于这本教科书，

自明治到战后，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都带有这样的特质。只记录本国的光荣史，以期激发对本国的自豪感，这种记述方法今后将何去何从？我认为我们必须遏制这样的发展趋势。而且，其他的日本史教科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不仅仅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版教科书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本国史这一整体、一国史记述的实际形态。如果我们仅仅集中攻击这一本教科书，将无法完成上述使命。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本教科书极端地表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以对这本教科书的批判为起点，阻止互相之间所存在的，单纯自吹自擂的，仅仅记录异质性、固有性的历史叙述。

但是，一定有人会煞有架势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记述不正是该反映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吗？对此我想说两点。首先，我们应该编写能够承载多样的历史观的相互讨论的教科书。所谓历史教育，并不是要将某种历史观判定为正确并强加于人。对各种历史见解进行讨论不才是最重要的吗？在此意义上，这本教科书与我们的目标完全相反。

另一个问题是：因为历史观是自由的，所以就什么都能写吗？这已不仅是历史叙述的问题，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社会意识、舆论形成的问题进行思考。比如“我喜欢战争”、“让我们踊跃地发动战争吧”，这样的写法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本教科书中虽然还不至于写成这样，但有些地方的确让人感到作者是有此念头的。此外还有对他国国民的冒渎性的记述。在美国，有关人种歧视的叙述总会引发问题。这样的叙述在美国社会是不被允许的。在欧洲，美化纳粹的教科书也为舆论所不容。我认为，这一层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作为教科书的问题来看待，那么只不过是重复同样的问题而已。这不仅仅只是“历史观是自由的”这一层面的问题，至少在我个人来看，这是面对未来“究竟什么样的价值值得我们悉心培养”的重要课题。

为确保这一价值真正不只成为一种自吹自擂，在报告的最后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与韩国、中国的各位的对话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

<sup>1</sup> 本文基于以下演讲及报告，经数度改稿及补注写成（“前言”中作详细阐释，在此仅作说明）。

2001年，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立命馆周六讲座”演讲；

2003年，大韩民国东西大学研究生院特别讲义；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特别演讲会；

2007年，大韩民国暎国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大韩民国高丽大学文科学院讲义。

其中，2001年于“立命馆周六讲座”所作的演讲讲稿载于『立命館大学土曜講座シリーズ 11 いま教育の現場で』（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全文主要针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初版（2000年）进行了批判。2005年及之后的演讲，则针对该教科书的改订本（2005年），添加了相应批判。此外，在暎国大学所作报告刊载于『アジア文化研究』第13辑（2007年）。

在韩国和中国进行有关教科书问题的演讲令我倍感紧张。在此，谨向在会场给予我严厉批判的中韩学者、教师、研究生以及大学生们表示衷心感谢。

<sup>2</sup> 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帝国》（水岛一宪译，以文社，2003年）。

<sup>3</sup> 姜尚中『ナシヨナリズム』（岩波书店，2001年）。在此特别参照“前言”部分。

<sup>4</sup> 高吉嬉『『韓流ブーム』と朝鮮半島イメージの二極分化現象』（韩国近代学会特别研讨会报告，2006年，于釜山韩国放送广告公社讲堂）。

<sup>5</sup> 参照「儀義文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linkclub.or.jp/~teppei-y/tawara%20HP/>）、「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主页（<http://www.nc.jp/asahi/kyokasho/net21/>）等。

<sup>6</sup> 以下，有关德川时代的历史书，主要参照丸山真男编『日本の思想⑥ 歴史思想集』（筑摩书房，1972年）、『日本思想大系48 近世史論集』（岩波书店，1974年）、小泽荣一『近世史学思想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4年）、玉悬博之『近世日本の歴史思想』（鶴嶋社，2007年）等。

<sup>7</sup> 本文中的“公家”直接引用自原著，指与幕府相对的天皇朝廷的朝臣、贵族等。——译者注。

<sup>8</sup> “神代”一般指神武天皇即位以前的神话时代。——译者注。

<sup>9</sup> 福泽渝吉『文明論之概略』（岩波文库，1931年）189页。

- 
- <sup>10</sup> 同前注6, 参照小泽荣一『近世史学思想史の研究』。
- <sup>11</sup> 白川静『字統』(平凡社, 1994年)361页。
- <sup>12</sup> 《说文解字》参照电子版 <http://chinese.dsturgeon.net/> 的1923。同时参照《康熙字典》子集下“又部”。
- <sup>13</sup> 有关水户学, 参照日本学协会编『大日本史の研究』(立花书房, 1957年)、『日本思想大系 水戸学』(岩波书店, 1973年)、『日本の名著 藤田東湖』(中央公论社, 1947年)、『水戸市史(中)』第一至第四卷(1976年)等。
- <sup>14</sup> 参照新井白石著『読史余論』(岩波文库, 1936年)105页等。
- <sup>15</sup> 有关近代史问题主要参照伊豆公夫『新版日本史学史』(校仓书房, 1972年, 初版1936年)、『本邦史学史論叢』下卷(富山房, 1939年)、大久保利謙「明治初年の史学界と近代歴史学の成立」(『明治史論集(1)』筑摩书房, 1965年, 初载于『日本近代史学史』白扬舍, 1940年)、『日本歴史講座第八卷日本史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7年)、『日本における歴史思想の展開』(吉川弘文馆, 1965年)、小泽荣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 1968年)、『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⑦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吉川弘文馆, 1988年)、『日本近代思想大系⑬歴史認識』(岩波书店, 1991年)等。
- <sup>16</sup> 全卷共出现“道理”一词139次。在此参照前注6, 丸山真男编『日本の思想⑥ 歴史思想集』所收石田雄「『愚管抄』と『神皇正統記』の歴史思想」。
- <sup>17</sup> 参照「東洋史学の価値」(『史学会雑誌』24号, 1891年)等。
- <sup>18</sup> 宫川寅雄『日本美術史叢書 岡倉天心』(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6年)。
- <sup>19</sup> 参照『新版韓国の歴史 国定韓国高等学校歴史教科書』(明石书店, 2000年)等。
- <sup>20</sup> 以下有关“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版教科书, 出版部分参照、『歴史家が読む「つくる会」教科書』(青木书店, 2001年)、和仁廉夫『歴史教科書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社会评论社, 2001年)、上杉聡、君道彦、越田稔、高島伸欣『いらない! 「神の国」歴史・公民教科書』(明石书店, 2001年)、『歴史教科書大論争』(新人物往来社, 2007年)等。改订版主要参照打开的历史教科书之会编『「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の〈正しい〉読み方』(青木书店, 2007年)等。此外, 有关“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本身, 除前注5的网站之外, 另参照『季刊戦争責任研究』第15至17号、第29号、第35号(1997年、2000年、2002年)等。
- <sup>21</sup> 『従軍慰安婦』(三一新书, 1973年)。
- <sup>22</sup> 参照前注20『歴史家が読む「つくる会」教科書』。
- <sup>23</sup> 参照『史』45号(2004年)等。
- <sup>24</sup> 参照前注5「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的「【資料】つくる会内部抗争の歴史」。
- <sup>25</sup> 依义文的解说参照前注5「依義文のホームページ」。